

JIANG SHI JIA ZU DI SAN DAI SHENG HUO JI SHI

蒋氏家族



张树德 ○ 著

第三代生活纪实

蒋氏家族第三代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一代人，他们的祖辈、父辈都曾权倾一时，他们中的核心人物也曾想恢复先辈的荣耀却都没能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在政治风浪中搏击，有的遭受政治重挫，有的选择远离政治，成为一代“悬崖边的贵族”。

团结出版社

2000年10月15日 星期三 第1000期

蒋氏家族



第三代生活纪实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采访、调查、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的一部关于蒋氏家族第三代生活的纪实作品。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触、细腻的情感，真实地再现了蒋氏家族第三代的生活轨迹，是了解蒋氏家族第三代生活的重要参考。

蒋氏家族第三代生活纪实

张树德 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氏家族第三代生活纪实/张树德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14 - 483 - 5

I. 蒋… II. 张… III. 蒋介石 (1887 ~ 1975) - 家族 - 史料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45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 170 毫米 × 230 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84 千字

印数: 8000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14 - 483 - 5/K · 479

定价: 3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引子 蒋氏家族的历史

大浪淘沙，风云聚散，蒋氏家族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这个政治家族的形成、发达是近代中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也是蒋家成员苦心“经营”的结果。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不再有“贵”族生存的土壤，蒋氏家族成员平民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审时度势，弃政从商，蒋家第四代也许会在商界创造新的辉煌。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游历南京后曾留下这样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在感叹古都的凄凉，家族的没落。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有许多家族得以青史留名，让后人评说。家族史，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大浪淘沙，风云聚散，只有那些“人才”辈出，“名流”相继，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较深影响的家族，才可能成为史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变幻着政治风云，凝结着人世的沧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社会影响最深、最大的要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两句顺口溜：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四大家族中地位之高首推蒋氏家族。蒋氏家族三代人中，高官辈出，权倾朝野，是任何家族不可比拟的。蒋氏家族以第一代核心人物蒋介石以一介武夫崛起于乱世，出任中国最高统治者长达22年（1927—1949）之久，后来又台湾地区主持政局长达25年（1950—1975）之久。第二代中蒋经国在大陆曾身居要职，后继父亲主持台湾政局十余年；蒋纬国长期在军队任职，军阶最高达上将，先后出任装甲兵司令，三军大学校长等职。第三代中也有多人活跃在台北政坛，其中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长”，后任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如果以所出高官多少来评判，蒋氏家族可以称是近现代中国少有的望族名门。

蒋氏家族声名显赫，高官辈出，有着独特原因。第一，蒋家成员与中国现代史的许多大事都有联系，特别是与许多坏事有关。其中以屠杀民众，大



搞独裁统治最为典型。第二，蒋介石发迹后，大搞家族政治，任人唯亲，使他的子孙、兄弟、亲眷都成为政府要员。蒋氏家族是畸形社会、畸形观念形成的畸形产物。

蒋氏家族的形成和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帝国主义经营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寻找和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再加上中国经济的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军阀割据和强人政治的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与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的强人政治和垄断财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蒋氏家族或以其为首的四大家族，也会出现其他的统治集团和家族。而后来蒋氏家族第四代最终宣布弃政从商，也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

蒋氏家族的形成和结局，也是一种人为的结果。蒋介石是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如果没有他，蒋氏家族也就无从谈起，蒋家曾拥有的一切都将是个未知数。正是因为他的作用，他的家人、亲眷才能成为显贵、名人。

蒋介石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1927年前是个地道的革命者形象。1927年后是个十足独裁者。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动荡岁月，乱世中出怪事，使他一个“无赖”成为枭雄。大多数中国人对蒋介石的感情是憎恶、愤恨。在他当政几十年间，只有算卦、看相、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个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公开赞扬他。

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1887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叫溪口的小山村。清朝末年，浙江省是大清疆土中最小最富庶的一个行省。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风气也比较开化。蒋介石出生时，蒋家已弃农经商，祖父蒋斯千、父亲蒋肇聪都是精明的商人。溪口虽小，但地处交通要道，便于经商。蒋家在当地是个富裕的家族，而蒋氏在当地是大姓，所以蒋家在当地很有声望。

蒋介石的父亲比母亲大22岁。娶母王采玉时已连丧二妻，而王氏也是丧夫寡居。蒋介石是他们结合后的长子。小时也是很受娇宠。不幸的是蒋介石9岁丧父。同父异母的兄长侵吞大部分家产后，与他们母子分家。王采玉被迫带着年幼的儿女生活。蒋家家道殷实，不必为衣食忧愁，但孤儿寡母受乡人欺侮也是常有的事情。蒋母把振兴家业，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先生的私塾中学习吟诗作对，以求科举成名。幼年的蒋介石似乎对读书兴趣不大，而是热衷于游泳、打仗，由于在做事中显出儿童少有的痞子行径，被乡人骂为“瑞元无赖”（瑞元是蒋介石的乳名）。

蒋介石从5岁启蒙开始读了10年私塾，这期间也曾换了几个老师。15岁那年，他曾到奉化县城参加“童子团”，结果名落孙山。这次科举失利，



对他触动很大，他意识科举已无前途，要跟上时代潮流，必须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他征得母亲支持到奉化的风麓学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学堂里的学生们不满当时的教育内容，在一场以“改革教育”为口号的学潮中，蒋介石被推为代表同校方交涉，结果受到校方严厉处分，被迫转学宁波箭金学堂。

箭金学堂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主讲人顾清廉是位有着新思想的学者。他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主张维新，鼓吹革命，蒋介石在这里首次听到了孙中山的名字。

另外，这位顾老先生还主张强国必先强军，这是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军人在中国社会是受到轻视的，许多人认为军人只是凭血气之勇，逞体力之能。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军人的作用。他们努力提高军人的威信，传播军事知识，大力宣传军事科学。顾老先生就是这种学者，他把《孙子兵法》借给蒋介石，要他仔细阅读，认真揣摩。这激发了蒋介石从军的念头。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逐渐强盛。中国军界开始崇尚日军的职业化和高水平组织工作。中国民族主义者受到日本军事大量发展的鼓舞，于是他们开始借鉴学习日本的经验，大批青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向日本学习比向欧洲学习要经济得多。日本路费比欧洲少得多，学习日语也要比学习欧洲语言容易。

受进步思潮影响，蒋介石对留学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写信征求母亲意见，为了表决心，他剪去辫子。王氏虽然不愿他出国，但最终还是为他凑足了费用。1906年，蒋介石首次赴日，日本让他大开眼界，也令他无奈。日本军校只接受清政府官派留学生。蒋介石只好在日本学习日语，半年后回国。当时正值保定陆军学校招生，蒋介石以优异成绩考取。在保定军校他凭着刻苦努力，赢得校方赞赏获得公派留学日本的资格。1908年，蒋入日本振武军校。1910年，蒋介石到北海道新火炮兵联队实习，充当二等兵。

在日本留学期间，蒋介石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军事知识，日本本身就是学习西欧，自己的军事知识并不丰富，另外，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实行保留政策，并不想让中国人学到先进的军事知识。在实习期间，蒋介石的主要工作是为长官擦皮鞋，洗衣服，喂养战马。在日本留学，蒋介石最大收获是结识了陈其美。一位同盟会骨干，上海青帮重要成员。在他的引荐下加入同盟会，成为留日浙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加入反清革命者的行列。

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急忙从日本赶回，参加杭州起义。蒋介石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敢。起义结束后，蒋介石成为陈其美手下的沪军第五团的团



长。在随后几年，蒋介石又追随陈其美参加大部分革命活动，并逐渐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随着孙中山的一些得力军事助手相继牺牲，蒋介石逐渐成为孙中山倚重的军事将领。1925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并不想接任，但后来他充分认识到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从上任伊始，他就努力培植自己的嫡系，后来又利用东征树立了个人威信。成为广东军政府的核心成员，此后他大搞阴谋诡计，排挤共产党，打击政敌，成为广东政府的实权人物。北伐战争使他真正攀上了权力顶峰。

这个时期，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受到了国人的尊敬。在战场上他作战勇猛，屡出奇谋，受到上司的信任，同事的赞许。如果他那时战死，会成为光荣的革命先烈，让壮士扼腕。

表面的现象往往掩盖了许多内幕。蒋介石根本不算是赤诚的革命者，只能算是革命投机分子。巴结陈其美，取宠于孙中山是为了扬名升官，实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工作中常常拈轻怕重，挑三拣四。另外，他在上海吃喝嫖赌，唯利是图让许多革命同志不耻。这些行为在后来的年月里都得到了注释。

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后，蒋介石开始对潜在政治反对派开刀，他策划“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又同有相同政治举措的汪精卫等合流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权力过度膨胀，引起各派势力不满，几派势力联合反击，蒋介石被迫下野。此后不久，他东渡日本同宋美龄结婚。

宋是蒋介石第四位妻子。为了得到宋，蒋不得不抛弃元配毛福梅，小妾姚冶诚和陈洁如，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蒋宋的结合堪称是中西合璧的婚姻，绝妙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合。

宋氏家族成员全都是中国现代史册上的风云人物。父亲宋查理是个华人传教士，早年流浪美国，后回上海靠卖《圣经》发家致富，并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宋家子女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深得西方文化真传，回国后立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宋家第一个有作为的是天资聪颖，抱有崇高理想的宋庆龄。她嫁给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宋美龄后来居上。

宋美龄是个有着极强权力欲望的女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女人直接参政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她选择了军事独裁者蒋介石，一个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宋美龄良好的美式教育，成为蒋介石同西方沟通的一座桥梁。宋美龄没有外国血统，也并非在外国出生，但是在中国人中间，她却总有点像一个外

国人。她在美国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中上层妇女的派头。一个美国记者形象地称她为“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固然是夸张，但也是有道理的。宋美龄以讲排场、爱出风头著称。



雍容华贵的宋美龄经常出国活动。“二战”期间，在中国美龄是美援的代名词。她那声情并茂的演讲，小恩小惠的施舍，博取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马歇尔向记者们惊叹说：宋美龄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

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娴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但表象代表不了本质。正像一位美国记者说的那样：“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

宋美龄是个有着满脑子西方思想的中国人。她了解西方人的观点，懂得外国人心理。可悲的是除了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她可以为丈夫担任高级翻译，却不能为丈夫与中国人民沟通思想。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蒋宋之间也常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有人曾预言他们的婚姻只能维持1年，但两人却维持了终生。他们的婚姻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资产阶级从未能割断同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结成夫妇。大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在相互碰撞，相互妥协中生存，直到1949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这种状态，台湾地区却得到了延续。这同蒋宋的婚姻一样。

同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又得以官复原职，重新获得权力后，便大肆运用军警、特务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个性乖戾的蒋介石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独裁的体制，也正是这种制度注定蒋介石以后要走的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蒋介石的个性中也曾有这两个利益集团的特点。

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怕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



胆。

南京国民政府中，资产阶级的势力一直处于优势，所以蒋介石自己的性格，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像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手腕。蒋就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士的欢心。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使蒋的买办性复杂化了。蒋虽是个专制寡头，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氏族首领。他为人要比旧式军阀精明，但在政治上却仍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通过地主豪绅的代理人——村痞、狗腿子、打手等等——统治农村，通过地痞流氓、“青洪帮”统治城市。蒋既是封建暴君、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秘密帮会的把兄弟，又是政党领袖；既是一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是它的无冕之王。他的哲学、个性、思想以致日常行动都是由此决定的。

蒋介石的形象有点忧郁，也有点滑稽，总是充满了矛盾，时而又带有悲剧色彩。构成悲剧的主要因素，在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蒋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企图通过封建主义实行资本主义，通过儒家学说实行基督教义，通过专制独裁实行民主，通过沙文主义实行民族主义。到头来，徒然造成一团混乱。

蒋介石地位稳固后，他便开始对反对势力开战。他先是向党内的反对派和军阀势力开战，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先后被击败，通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各派军阀势力都在表面上臣服于他。与此同时，他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了5次围剿，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正当蒋介石洋洋得意之际，一股外部势力已悄然而至，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人侵华是蓄谋已久的事情，早在日本读书时，蒋介石就断言，日本和俄国都会对中国造成威胁。面对日本人的侵略，他却不抵抗，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是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常常因为草率从事而自食苦果。在军阀看来，蒋和他们一样，无非是最大、最有权力的。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把他当作领袖，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他，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如此，内战期间也一样。不过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张学良。

蒋介石最大判断错误是在“九·一八”后，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虽心存不满，但最终还是服从了他的命令。从军事角度来讲，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指示，当时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消灭共产党。1931年蒋介石制定的政策是惨痛的失败。它给中国人民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正因为如此，少帅张学良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逼他抗日。不光彩的获释，周恩来的出现，使他对张学良大加怨恨。张学良留他一命，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囚禁了这位年轻的将军，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它让蒋手下人心寒。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建议释放张学良，让他到东北主政，蒋介石却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继续囚禁他。共产党却棋高一筹，派十万官兵到东北，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奠定坚实基础。从张学良事件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缺乏一个政治家基本的素质——宽广的政治胸怀。

“剿共”的失败和西安事变影响，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但日本人不给他时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此时还抱着许多不切合实际想法。淞沪战役爆发后，他指望列强干涉，该撤时不撤，使大量精锐部队被日军消灭，上海和首都南京被日军迅速占领。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淞沪战役失利后，蒋介石像只被打伤的狗，狼狈的向内地逃窜。他把自己的嫡系调到内地，而让地方军阀的部队节节抵抗。从军事上看，蒋介石撤退部队用空间来换时间的战略是正确的，但长远看来却是错误的，而且是毁灭性的政治错误。与国民党军队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东进抗日，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战斗中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使大量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百姓都聚集到这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周围。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人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从军事角度看，向内地撤退是正确的，但这让大多数爱国将士反感，人民也痛恨不抗日的军队。在抗战初期，大部分军队经过艰难困苦转移后方，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但很快被腐败之风吹淡。国民党官僚们很难适应重庆这



个战时首都。这里交通拥挤，房屋矮小，气候炎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这里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风气随着空气的传播弥漫着整个后方。蒋介石对自己的操行深信不疑，但对亲眷部下的贪污腐化却视而不见。一个贪污腐化成风的政府是不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的，垮台是迟早的事情。

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和苏联都曾支持过蒋介石政府。但“二战”结束后，由于人事变动和利益，美国和苏联对这个政治小丑都采取了放弃态度。而这时蒋介石却气势汹汹的挑起内战。挑起内战是蒋介石的错误，这加剧了他走向失败。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失败后，东北战场的胜负成了关键，释放张学良回东北主政的建议被否决后，从东北撤军强化南方统治建议也被否决。最好战略和明智建议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蒋介石希望永远保住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东西，结果失去了全部。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与毛泽东一决雌雄的战争已是胜负可见了。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大军迅速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被迫率残兵败将撤退到台湾。还好陈诚、孙立人都没敢“趁火打劫”，都尊他为领袖，让他在孤岛上重整旗鼓，做“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一直处于恐惧之中，他和他的追随者只能默默祷告，而对共产党“解放台湾”无任何阻击妙策。朝鲜战争爆发挽救了蒋介石。美国人重新拾起这颗被遗弃的棋子，大量军援涌向台湾，第七舰队也侵入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解放台湾”。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解除后，他开始通过政治改革来加强独裁统治。台湾地主阶级由于土地改革势力被削弱，大陆时的各派领袖都相继被排挤离开政治核心。四大家族变成一枝独秀，潜在的政治对手，吴国桢、孙立人、陈诚先后是逃、囚、死。蒋介石在台湾一手遮天。20世纪60年代末，父子传承之势已成，台湾是名副其实的蒋家天下。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北。我们怎样评价蒋介石这个人呢？作为一个军人，在辛亥革命期间，表现了少有的英勇。20—30年代，作为军事指挥官，他对战术非常了解并能正确运用。在以后他成为一个战略决策者，他的战略是避免失败，而不是争取胜利。在抗日战争中，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内战中葬送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他善于控制竞争对手，却不了解自己政权的社会基础。他知道共产党的威胁，但他永远制订不出高于共产党的战略战策。作为领袖，他没有令人称道的学说



和作品。

蒋介石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却从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的农民，并没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直到被农民的怒潮冲倒时，还不清楚为什么。有人说蒋介石是生不逢时：“如果是50年代或100年前，他可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位领袖。”

蒋介石的政治目光是向后看、向外看，就是没有关注过现实社会。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蒋却以当代儒家标榜，奉行王道学说，皈依基督，接受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施政之道，是效法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独揽大权。蒋介石机械地搬用古代巫医发明的处方，来医治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未能奏效，就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农民是因为“不孝”才造反，知识分子是因为“不义”才批评他，将领是因为“不忠”才倒向共产党。也就是说只有他才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这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反而感到蒋介石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使这位“高贵者”为“卑贱者”所唾弃。

崇拜蒋介石的人曾把他比作拿破仑。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通过搞政变上台，而且都是掉转枪口反革命的，但是那位法国皇帝是天才的军事家、干练的组织家和有创新精神的行政家。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战略上他一窍不通，组织上他毫无章法，行政上更是一塌糊涂。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轰倒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蒋介石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从来没有同本国的封建残余进行过斗争。拿破仑是威震异邦的伟大征服者，蒋则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顺从奴才，况且，像蒋这样一个昏庸的党棍，同曾经把“拿破仑法典”赋予欧洲的那位伟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也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因为他性情暴戾，而且总是板着脸，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蒋在对待自己的部下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像泼妇一样的叫骂、摔茶杯、拍桌子。希特勒也如此。这两位独裁者有一点倒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因不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希特勒还有一定的风度和一定的创造性。而蒋则既没有风度，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比起蒋介石来，希特勒的吸引力要强得多。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构思怪诞，总还包含一点激情，包含一点近乎高尚的东西。而蒋则至少在公众场合从未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希特勒激励了战败的德国人民受伤的心灵，可是蒋除了使人感到恐惧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甚至他的最热诚的支持者——的心头激起真正深刻的感情。希特勒是宗教狂，虔诚地相信天赋予己的使命。而蒋是一个思想混乱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但却没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确思想



和高明策略。希特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而蒋却不过是一个既无能耐又想当圣贤的“领袖”。

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个十足蠢材。

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变、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1926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1927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

蒋上台后，就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斗，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

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方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着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伏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像一根千钧棒一样，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

究竟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

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搞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上，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像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



蒋从不相信任何人，自以为一贯正确。他下过成千上万道命令，下级都对之唯唯诺诺，但是这位委员长却并不怎么了解人们究竟是怎样执行他的命令的。他似乎从来不明白，用一个地主指挥全村事情那样的办法来指挥全国范围的事务是不行的。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差不多直到他下台为止，他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蒋介石待在离前线两千英里的后方，向部队的指挥官们下了无数道命令，叫他们采取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他曾对史迪威说：“我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揣测他们（将领们）可能会干什么蠢事。然后我就发出命令，叫他们不要去做这类蠢事……这就是指挥他们的秘诀……你得想象出他们可能犯的各种错误，然后告诫他们别那么干。”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师长们不按照实际需要办事，而是一味迎合他的旨意办事。

上面讲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蒋有控制他部下的无限权力。其实即使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别人并左右局势。列夫·托尔斯泰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同其他人最牢固、最持久、最累赘也是最经常的关系就是所谓支配别人的权力，其实这意味着对别人最大的依赖。”这些简直像是针对蒋介石说的。他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位中国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农村的家族势力与城市的买办势力之间搞平衡。由于他在两方面都有敌人，他就努力在军内和党内，特别是在秘密警察中建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体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牢牢控制局面。但是，随着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统治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甚至完全不管用了。原先的社会组织者背弃了他，他进一步成为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势渐成，险象环生。中国的独裁者把握不住局势的发展。这时专制体制本身成了极大的障碍。蒋介石周围都是马屁精和密探，对于他的官僚等级机构内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人随时向他汇报。但是，当斗争的范围扩大，变成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或是像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起义时，由于手下的人谎报军情，把他蒙在鼓里，加之他素来疑神疑鬼，偏听偏信，这样就搞得自己更加孤立，更无法准确地预见事态的发展，而像一个盲人失去了引路狗一样到处瞎撞。

在抗日战争初期，蒋的顾问们说，只要他坚持在淞沪抗战，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进行干预。于是他就没有把部队集中在内地，以充分利用后方辽阔的优越条件。相反，他把78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日本海军威力所及的沿海地区，结果使他的精锐部队被歼，自己也不得不逃到1500英里以外的重庆。内战初起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宣称他们可以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于是撕毁了



马歇尔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贸然发动了进攻，因为他没有准确的情报。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将军认为最好还是撤出满洲，但蒋的特务进谗言，此人正同美国人密谋取蒋而代之。于是蒋偏下令死守满洲，直到部队全被歼灭方休。1948年11月，他的空军报称在徐州获得大捷，于是蒋就死守徐州，共军乘机攻击他的后方，终于包围并基本歼灭了他的两个兵团，直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党头目说，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和平，这完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因此蒋便听任军警驱散游行队伍，殴打学生，而不加制止。他的秘密警察告之说，写文章抗议通货膨胀的教授是共产党，于是蒋就下令逮捕这些教授。外国记者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岛上开枪打死打伤了手无寸铁的银行家、律师、教员、学生和农民，这位委员长竟斥责记者报道失实，有损中美人民的友谊。

这种狂妄专横的态度，这种除了自己的亲信、特务的报告外其他情报一概不信的态度，这种对震撼中国的激烈社会动荡视而不见的态度，使这位委员长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思想境界，简直可以说是神经错乱。随着战局日益失利，蒋更加脱离现实环境，遁入自己虚构出来的世界之中。

他想成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哲学大师，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史迪威说：“我们一目了然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通……他不顾常理，只凭自己的直觉办事，借口中国人心理不同而随意撇开已经证实的规律。”

蒋毫无科学知识，却企图指挥美式装备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干脆像共产党那样完全按照中国的办法去打仗，结果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他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外国的心理，他就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来对付列强，沿用“以夷制夷”的祖训，企图挑动列强互相争斗，以从中渔利。结果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列强。

蒋的孤陋寡闻造成了他性格上的严重缺陷。他早年曾以勇敢果断著称，但是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期间，这一优点已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要对付一个既无法讹诈或收买，又无法欺负的敌人；在剿共战争中，他要对付普通百姓的大规模造反。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不得不同自己所不熟悉的手对手打交道，因而才穷智尽。而且蒋越是意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危险性，就越加胆怯，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1937年淞沪之役，他不愿后撤，长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致遭到惨重损失，断送了他最精锐的部队。1947年和1948年间，他一意孤行，在山东地区始则盲目冒进，继而迟疑不前，举棋不定，接着又死守阵地，不进不退，结果闹得他的一些将领愤而投奔共军。



蒋并不是软弱之辈。但是他的坚强性格常常化为固执。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变得刚愎自用，有时不免犯多种毛病：办事凭意气，而不按照一种信念或大的原则。正是由于他的固执，使他不顾张学良少帅的一再警告，不相信张的东北军再也不愿打共产党了，结果酿成1936年的西安事变，他被扣押起来。他的愚顽不化使他在1942年撤销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让中国远征军取道印度撤出缅甸，致使许多士兵在西藏的穷乡僻壤迷途丧命。他的刚愎自用使他在1945年不顾魏德迈将军的劝告而进军满洲。最后，还是由于他盲目地固执己见和疯狂地自以为是，使他不顾手下将领们的一再告诫，不相信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结果搞得文官不愿主持政务，武官拒绝挂帅上阵，外国也拒绝继续提供援助。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称之为坚韧不拔。要是那样的话，当年希特勒命令西线德军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伦斯泰德死守诺曼底，命令西线德军死守莱茵河，致使全军覆没、战争失败，不也可以说坚韧不拔了吗？

闹到最后，蒋介石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脱离了拥护他的人们。不管将领们要求他下令后撤也好，司徒雷登大使要他实行开明政策也好，结果全是枉然。到头来，将军被撤职，知识分子被枪毙，学生被殴打，司徒雷登大使则被回敬孔子遗训一则。

由于虚荣，蒋无法改弦更张。由于“高贵”，他不能同贫贱者接触，由于有“德”，他可以懂得仁、诚、忠，却不懂人民需要宽厚、同情和希望。他号称信奉基督教，却没有丝毫慈悲心肠。他自称革命，但总是朝后看。他在战场上缺乏勇气，在政治上缺乏创见，在治国方面缺乏公正。他既不能统率大军南征北战，又不能制订宏伟的政治纲领，也不能提倡任何重大改革。总之，蒋脑筋陈腐，完全落伍于时代，根本无法承担肩上的重任。

最后，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是个重亲情、乡情的人，他得势后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他的亲眷、朋友、同乡都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恩惠。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是毛福梅1920年所生。关于蒋经国是不是蒋介石的儿子，近年来社会出现了争议。其中蒋纬国曾披露说，蒋介石没有生殖能力，蒋经国是毛氏与乡人通奸所生。李敖也曾对蒋经国的出生时间，怀孕时间提出过质疑。对于这些说法，孔令伟，蒋介石的侍卫都曾出面辟谣，以